

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三重意涵

管 宁

摘要: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主体性是体现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当代实践等不同维度与领域之中的价值观、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基因特征。从文化政治意涵看,文化主体性既内在地决定着政治制度,又受现行国家制度的规约;传统“仁政德治”、崇尚善治等思想,成为现行制度文化内在智慧构成;海纳百川、天下为公的思想理念,使马克思主义从被接受到中国化成为可能,为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制度支撑。从文化美学意涵看,文化主体性中的“文化-思想”逻辑虽然来自“政治-历史”逻辑,却具有跨越民族、跨越国度的更广阔更深厚的内涵。传统文化美学不仅能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传播核心价值观,而且能以独特的美学风格与气质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构筑起文化主体性的本体支撑。从文化实践意涵看,文化政治意涵是文化主体性政治理想的呈现形态,文化美学意涵是文化主体性理论认知的呈现形态,而文化实践意涵则是文化主体性现实具体的呈现形态。文化政治、审美意识形态所确立的文化价值向度、审美取向,必须由文化实践创造的成果作为实现形式,文化实践还将随着社会变迁、时代进步而提出新的问题与诉求,从而不断推动文化政治、文化美学的更新发展,成为文化主体性的动力支撑。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新发展阶段;文化政治;文化美学;文化实践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2.01.008

一、引言

中华文化在迈进后小康时代之后,面临着新发展阶段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在历史长河中,文化作为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尽管不同时代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但始终是决定一种文明兴衰的关键因素。在中国发展越来越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阶段,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要素,其意义、价值和功能以及发展方式、发展趋势,都发生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变化。后小康时代,中国业已解决了落后“挨打”、贫穷“挨饿”的问题,但失语“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①。中国国家话语权和国际传播能力相较于经济地位而言,还存在一定差距和不相匹配,这导致“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②,因而,中国文化主体性构建不仅关系到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关系到国家形象的自我塑造,而且关系到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当然也内在地决定着中华文化当代发展走向与趋势。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三重意涵分析入手,梳理透析新发展阶段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阐发其内在的规律,思考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逻辑理路,有利于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所谓主体性指的是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自由目的性的一种能力、立场、看法及地位,是相对于他者而言的一种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存在状态。文化主体性则是指区别于他

作者简介:管宁,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副会长(福州 350025; gzy2001@sina.com)。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28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第329页。

者且有鲜明文化特质和价值立场的存在状态。狭义文化主体性限于文化艺术范畴,广义文化主体性则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经济、政治、社会等诸领域范畴。文化主体性对于个人而言即是区别于他者的文化立场、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态度,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则是有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制度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尽管在漫长历史发展中一个民族国家可能程度不同地吸收外来文化,但如果其文化基因、历史传统与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并拥有在此基础上的坚定文化自信,就具备有文化主体性。在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互联网时代,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体性既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所构成的文化殖民威胁,也面临着传统文化土壤流失、价值观念混杂等境遇。因而,文化主体性关乎民族文化认同、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充满曲折与艰难,而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在现代转化中,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其独立的主体地位,不仅是一个需要长期艰辛探索和努力的问题,也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重要问题。“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强盛的标准:不仅取决于经济社会因素,更取决于文化因素;经济繁荣解决的是衣食住行的生存需求,文化繁荣解决的是安身立命的精神需求。经由工具理性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固然重要,但倘若没有价值理性所建立的精神支撑,尤其是源自于民族自身文化传统的精神支撑,即便物质再丰富也将是建立在沙滩上的阁楼,随时有倾塌的危险。文化主体性作为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制度文化等的综合表达,呈现为一种包括历史、观念、制度、实践等在内的多维结构体系,如价值观、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以及制度框架等,内在地体现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当代实践之中。因而,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就其主要面向来说,关涉到文化政治、文化本体(美学)和文化实践三重意涵;文化政治意涵体现的是一定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及其价值体系,文化美学意涵体现的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美学体系及其内涵,文化实践意涵体现的是民族历史文化的当下实践与发展状态;文化政治意涵确立的核心价值观,需要文化美学提供思想内涵支撑与形象化传播,文化实践意涵则是文化政治的价值向度、文化美学的审美向度践行与现实表达;三者互为交叉、相辅相成、互动发展,共同构成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的体现,不仅是一个民族文化在数量上的优势,而且要在其多维结构中具有精神主导、价值引领作用。同时,主体性不仅是文化符号外在的表象化呈现,而且是文化精神内在的无形气质展露;主体性不仅是固有的传统文化静止僵化的存在,而且是具有开放性和生命力的文化传统的鲜活呈现。因此,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应从把握和理解文化的政治意涵、本体意涵与实践意涵出发,确立其逻辑理路和实践方向,使传统文化的继承在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的结合中,从文化符号的显性传承走向文化精神的隐性发展,实现历史性的再造与更新。

二、文化政治意涵:主体性的制度支撑

考察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发展状况,离不开对政治体制及其相关政策的分析把握。文化虽然内在地决定着政治制度,为制度文化的形成与构建提供观念指导、价值指引,但政治制度一经建立,就对文化发展起到规约和规范作用。从人类文明视角看,政治文明体现一个制度的合理性与运行能力,在当代则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它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面向与制度支撑。当代中国政治文明是建立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

^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基础之上,明显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宪政体制、三权分立、为资本服务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必然要受到现行国家制度的规约,要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下展开主体建构,实现自身发展。把握文化主体性首先要从当代政治制度如何内在地规约了文化发展入手,使文化主体性在制度性支撑下获得这个时代所独有的政治意涵。任何时代的意识形态都决定着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①,以传统文化作为滋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拥有坚实的文化根基。

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并体现于影响人们行为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之中,体现于由此形成的政治理想与道德情怀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了伟大的建党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中创造了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洪)救灾精神等。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的文化创造和文化贡献”^②,内在地包含了中华民族不忘国忧、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不甘落后、勇于探索的文化基因。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必将使革命文化涵纳更多传统文化,更具民族特性。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理性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核心价值观所具有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也来自于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不论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如文明、和谐、平等、公正、诚信、友善等,都汲取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支撑。中国古代在长期国家治理和制度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迄今仍然具有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因此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③,梳理提炼传统文化中治国思想与文化智慧,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民族文化特性,而且有助于深刻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渊源,从而更深刻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思想根基,在制度层面阐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文化政治意涵。

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与治理是建立在孔孟儒家政治思想基础之上,从政治角度而言,儒家思想核心是“仁政德治”。《礼记·大学》中提出“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流传千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相融合,将宏大理想的实现与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强调政治理想与抱负的实现应从个人修行做起。孔子学说的核心“仁”所包含的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即是从君子的“以大道为志向,以德行为根基,以仁爱为依托,以六艺为修养”的全面修行出发,达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境界,并提出忠恕之道作为实现方式。如同有学者指出的,孔子还进一步提出“君臣共治”的政治哲学思想,君主要“为政以德”,“通过修身成德来获得人才,通过对人才的良好使用”,达到“无为而治”的国家治理效果,认为“社会得到善治是君主与臣下配合的结果”^④,从道德修养角度论述政治理想和国家治理,是传统中国文化政治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换句话说,“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中,政治领域并不被当作权益或权力

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第33页。

② 李书吾:《准确把握革命文化的科学内涵》,《文汇报》2018年5月2日,第12版。

③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https://news.12371.cn/2014/03/13/AR-TII394703097965940.shtml>, 访问日期:2021年10月15日。

④ 姬明华:《孔子的政治理想与现实选择》,《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

的冲突折中之场所,而被当作是一个道德的社区”^①。而经由长期文化积累与传承,形成了仁、义、礼、智、信、忠、孝、恕、廉、勇等被全民族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体系,“虽然主要是围绕个人品德修养和行为规范,但同样影响着社会与国家,对今天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②。传统文化中这一独特的治国思想,维系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明发展,也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政治伦理与道德思想资源。

古代经典《尚书》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深刻总结了古代国家治理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其核心要旨是:提倡明仁君治民之道;明贤臣事君之道。虽然《尚书》在思想倾向上趋向于以天命观解释历史兴亡,但也包含了敬德、重民的理性内核,提出的德治主张对后世影响深刻久远,构成儒家政治伦理的基础^③。儒家思想中对上下和睦、百姓安居乐业理想社会的追求,便是源于《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阐述。事实上,以人为本、关注人性、注重品德成为古代先贤们追求政治清明、大同世界的思想文化基础,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着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④。《尚书·周官》还主张“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此一思想沿袭至今而成为“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廉政道德诉求。而《尚书·五子之歌》中的“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亲民近民,以民生为国家之根本,唯有得民心方能使国家秩序井然、稳如磐石。古代先贤强调国家治理的人性与道德基础,强调关心民生、以民为本,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年而不缀的文明基因,涵养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与清廉文化,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与理想的历史源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基石之上。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悠久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滋养着当代价值观,而且成为现行社会制度文化的内在智慧构成。“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是维护巩固传统社会发展的稳定力量”^⑤。“为万世开太平”“协和万邦”、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理念是古代社会的政治理想与处理国家关系的思维方式,这些精神文化传统必然也融注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蕴的天下情怀,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传统理念文脉相通,形成了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和合”思想,即强调邦交正义、和谐共生、合作共赢,这一思想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零和”理念。“零和”概念源于博弈理论,起初由匈牙利数学家冯·若依曼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之后他与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顿合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形成了博弈理论,在理论经济学领域有着方法论意义,但当这一理论“从西方经济学的的一个公理上升为具有现代性特质的思维方式”即“零和”思维时^⑥,就形成了各主体之间的竞争呈现为不相容性,其结局不是互补共赢,而是胜者为王成为主体,其余则成为客体,并被主体所支配,由此导致弱肉强食、侵占掠夺均是合理的所谓现代性逻辑。而出自《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⑦的“和合”思维,则主张人类整体的大爱、和合的社会秩序,以促进不同群体相互尊重、和睦共生,而这一思想亦体现在今天的人

① 黄俊杰:《传统中国的思维方式及其价值:历史回顾与现代启示》,豆丁网:<https://www.docin.com/p-6776765.html>,访问日期:2021年10月15日。

② 张国祚:《习近平文化强国战略大思路》,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911/c112848-25643796.html>,访问日期:2021年10月15日。

③ 刘海龙:《〈尚书〉思想价值辨正——兼论儒家政治哲学奠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④ 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辨》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4页。

⑤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91页。

⑥ 张雄等:《历史的经济性质:“中国方案”出场的文化基因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⑦ 《国语·郑语》,徐元浩:《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66页。

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之中,成为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性思想。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与整体性,“三者汇聚成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流,构成当代中国文化优势的三大支点”^①。不难看出,这三者所构成的整体,具有严谨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内在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历史实践,成为我们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产物和既定的制度体系,其指导思想与理论构架必然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政治内涵与属性。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核心价值理念,是构成主体性的内在灵魂。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异域之邦,但却是具有超越时空域限和世界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与真理,不仅其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解放等思想与中国传统“求大同”的政治理想存在暗合,而且在与中国革命和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经由不断本土化和与时俱进的发展而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性与当代性,是中华民族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形成的新传统,它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思想乃势所必然。中华文化自古具有很强的“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与融涵能力,作为传统文化主体构成的儒释道,其中佛教就是外来文化,但被吸纳融合之后,成为民族自身文化的组成部分,从美学角度说,形成了禅宗美学体系,并与“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儒家美学、“以物为量”“大制不割”的道家美学^②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美学体系。佛教文化传播还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造物文化,佛教中坐床上的壶门装饰以及须弥座造型,被运用于隋唐、宋、明、清的家具之中,形成大量有壶门装饰和束腰造型的家具形制。而隋唐之后形成并逐步趋于完善的高座家具形制的形成,与西域传入的垂足而坐习惯存在直接关系^③。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符号的青花瓷,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其充满东方韵味的纹饰,如缠枝莲纹、莲花瓣纹、卷草纹和回纹等,最初都是来自波斯的民族风格图样,并以波斯钴蓝为原料烧制而成,只是中国工匠充分利用国画笔墨线条形成的独特美感,对波斯纹样进行了本土化加工改造,化繁琐为灵动,使其更具韵律之美,并融入松石山水、飞禽走兽和历史典故,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涵性与创新品格^④。这种吸纳外来文化,创化融入本土,形成如同己出的中国经典文化符号,充分体现了我们先人的文化智慧。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实现国家富强而进行现代文化启蒙,文化先驱们引进和吸收了大量西方民主、科学思想。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的包括白话文在内的一系列改造,虽然有过激之处,但骨子里还是传统的,比如胡适,“他曾提出过全面西化的主张,但他身上的传统道德修养,我们无话可说”^⑤。这个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文化的过程,实现了中国以古典诗词、歌赋、绘画、书法、散文、戏曲、歌舞等艺术形式为主的古代文化,向以现代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舞蹈、油画以及交响乐、芭蕾舞、电影、话剧等为代表的现代文艺转型,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形态。但新的文化形式却内在地传承着中华传统美学原则与精神,即便是现代国画,虽然受到西方油画表现方式与手法的影响,依然显示着独特的东方艺术韵味与风格,如吴冠中融汇中西绘画的当代国画,因将西方绘画与中国画作了完美的融合,并显现出鲜明的中华美学气质,成为本土化、民族化的现代国画,不仅实现了国画的现代转型,而且丰富了传统绘画技法与美学风格。诸多事实表明,中国传统儒学的“思想及其价值观既有着内包性、中庸、不断复制历史模本的保守性一面,同时也有着内在否定、内在超越和自我更新的一面”^⑥,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思想理念,使得传统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无限活力,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马

① 汤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红旗文稿》2019年第19期。

② 朱良志:《一花一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11页。

③ 马书:《明清制造》,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6页。

④ 王爱红、罗顺仁:《中国伊斯兰风:明代正德官窑青花瓷装饰纹样研究》,《中国陶瓷》2021年第2期。

⑤ 刘梦溪:《中国文化的张力:传统解放》,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303页。

⑥ 张雄等:《历史的积极性质:“中国方案”出场的文化基因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克思主义经由中国化而成为指导思想这一当代现实。事实上,今天我们所说的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活的灵魂,是经由实践证明符合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创造性吸收外来文化而形成的具有真理性的理论。

因此,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就其政治意涵来看,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推进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价值引领,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沃土,不断凝聚和升华革命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发展,使文化主体性建构有利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文化美学意涵:主体性的本体支撑

文化主体性的政治意涵,既为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制度框架与体制保障,也明确了主体性建构的指导思想、身份属性与历史源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涵的丰富政治理念、治国谋略,从文化政治层面确认了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民族身份与诉求,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思想,则能够从文化本体层面确认主体性的本土属性与特质。传统“仁政德治”等文化思想从制度文化角度,不仅滋养着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而且在与时俱进的实践中日益丰富和完善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文化主体性建构获得稳固的政治保障与身份属性。但文化主体性的政治意涵是基于“政治-历史”层面的建构,构成对文化创造中宏大叙事的主导与规约,而这种宏大叙事所形成的“以革命、人民性、英雄主义为核心的国家集体话语”,还需要有体现“文化-思想”层面的社会个人话语作补充^①,以实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强调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文化-思想”逻辑虽然来自“政治-历史”逻辑,但它不仅是后者的重要补充,而且具有跨越民族、跨越国度的更广阔更深厚的内涵。从中华民族自身视野看,传统文化美学不仅能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传播核心价值观,而且能以独特的美学风格与气质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构筑起文化主体性的本体支撑。当然,这个过程必须引入国际视野,即从传统出发吸收外来文化,将中华文化精华与西方文化优长融为一体,为世界提供具有当代文化高度的中国文化创造。

中华美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与完整丰富的体系,不仅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的活性基因,而且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构成,必然能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本体支撑。文化主体性的政治意涵虽然有利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但那是在制度性层面提供的保障,而要将文化身份认同嵌入民众内心,还有赖于中华美学在当代文化创造和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中发挥实质性作用,而传统风俗习惯在当下日常生活中保存的状态也对这种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因而,从文化美学层面,梳理和探讨中华古典美学核心理念及其当代运用、转化与创新的可能,可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本体性支撑。

中华文化美学在构成上主要是由精神文化美学与造物文化美学两个部分组成。由古代典籍、文艺名著、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构成的精神文化美学,是我们今天建构文化主体性可资运用的无比丰富的美学资源与独特体系;而由古建筑、古遗址、器物文化遗产,以及关乎传统技艺的造物文化美学,也是我们今天建构文化主体性可资利用的无比丰富的设计文化思想与独特理念。但必须看到的是,古典文化美学资源中究竟哪些是可资运用的需要有一个时空参照系,也就是说,古典文化美学其现实价

^① 张福贵:《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值与可能性,应放在当代社会进步以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水平的大视野下进行考察,放在当代社会人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现实需求的背景下加以衡量。事实上,基于这种视野与背景下的考察,古典文化美学大致具有三方面价值,一是以原初形态的存在就能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如文学经典阅读、文物鉴赏等;二是对古代典籍、文物等的创造性阐释与发现,即以现代新媒介手段进行的传统文化的现代演绎与表现,如唐诗、宋词与交响乐、京剧、通俗歌曲结合,文物、古代典籍的影视化文艺叙事等;三是以局部元素或以资源转化再造的形式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即运用传统文化作为符号元素进行再创作,或内在传递传统美学精神而创造的现代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单纯地梳理与阐述古典文化美学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当代时空背景下,引入历史视野去辨析、梳理、发掘古典文化美学的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将中华美学作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本体支撑。

不同的历史阶段,传统文化美学的价值与作用不尽相同,人们文化创造所依托的资源也不尽相同。一个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之本体支撑,按一般的理解应来自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或以本民族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审美追求和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创造。从这个认知出发,文化主体性的本体支撑不能仅从表面判断援引了何种文化资源,而要从内在本质角度分析以何种审美追求与思维方式去借助、依托各民族的文化资源。如同前述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理论资源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从其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从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家国情怀出发,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非拿一个西方“舶来品”取代和替换中国文化。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变革图存、复兴中华的文化启蒙运动。白话新诗的倡导,表面看是对传统文言诗歌的摒弃,但作为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五四新文化启蒙主体的初衷,却是内在地“传承了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情怀和精神,不断更新文化观念,表现出自觉的担当意识和历史责任感”^①,五四新文学作家们,为倡导先进文化观念,以文学领域倡导白话文新诗为变革开端,试图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他们一方面阐述和表达《诗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在面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需求时,已失去启迪和塑造现代人的作用,鲁迅就在《摩罗诗力说》中质疑《诗经》的“思无邪”之学说,指出,“盖诗人者,撝人心者也”,“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②,力求开辟一片中华文化新生之地。另一方面,其变革的初衷与动力,则是“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诗教传统的政治伦理情怀”,目的是“开启民智,重振国人精神,重塑民族性格”^③,其新诗创作的美学取向亦追求“兴观群怨”的品格,只是融入了更多启蒙思想、革命理念、个性诉求、婚姻自由等现代思想与情感,以构建现代诗歌新美学。文化启蒙思想的传播与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使儒家正统文化在那个特定的疾风暴雨的年代暂时退出了时代舞台中央,成为蛰伏于文化启蒙者内心潜隐不显的文化基因。

很显然,五四启蒙者为实现特殊的历史使命,开拓新文化发展的新空间,表现现代社会民主、科学、个性自由、妇女解放、劳工神圣等传统文化所鲜有涉及的思想内涵,必然要将宣扬温柔敦厚、止乎礼义观念的传统诗教搁置一旁。郭沫若《女神》《凤凰涅槃》等就是最具个性张扬和现代浪漫的新诗,但其个性表现则是与民众新的独立人格培育相联系,“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④。郁达夫笔下一系列“零余者”苦闷青年形象,他们的情感困扰与忧郁心理都是与国家贫弱、民族危亡的大背景息息相关,其中也凸显了知识分子寻求西方个性解放过程中对自身品性与精神世界的自我拷问与灵魂挣扎,表现出启蒙过程中传统伦理与时代观念之间的冲突。邓中夏则要求诗

① 方长安:《中国诗教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当代传承》,《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③ 方长安:《中国诗教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当代传承》,《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④ 郭沫若:《论诗三札》,杨枢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人应当表现时代精神，“须多做能表现民众伟大精神的作品”^①。现代作家们的主张与作品内涵指向，事实上恰与他们表面所摒弃的传统文化具有内在联系，体现了儒家政治伦理文化中的家国情怀、民族悲情与历史担当。

这一现象背后的缘由，有学者作了分析论述，认为任何精神传统，“绝对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一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是这个动态的过程受到冲击以后，它可能变成潜流；有的时候在思想界被边缘化，但它总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甚至有的时候断绝了，但它的影响力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是存在的”^②。这种情形在五四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晰，这与那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所具有的特定历史诉求相关联，是贫弱交加、外族侵辱、主权丧失、山河破碎的民族危亡时刻，具有“我以我血荐轩辕”^③之责任担当的知识分子们的历史选择。文化启蒙者的民生之叹、民族之忧、救国之志，使他们暂时将先哲温柔敦厚的君子修身、人格建构之论搁置起来，而承袭入世观念、政治理想之宏大情怀。事实上，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传统始终未曾移易，当西方世界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契机迅速崛起，而同时期中国则陷于近代清末政治腐败、经济落日渐凸显之际，就已出现一批知识分子致力于引入西学、变法图存，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提倡科学文化，推动以政治与教育改革为主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革新与再造。近代以来的西风东渐，使不少传统知识分子接受新学，思考旧学的改造成一时之风气，初期主要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性变革。王国维虽然接触了近代许多先进文化观念与维新思想，但并不排斥从小深受濡染的传统文化，对新学的追求过程中，善于将中国古典文化美学与西方美学思想相融合，并运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观点阐释中国古典美学，开辟与拓展了传统文化内涵与阐释空间。王国维基于他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学术造诣，既从时代需要出发，又着眼文化美学本体，将局限于少数文人群体的诗教，转向面向现代社会大众群体的美育，并在中西美学的结合中，延伸与拓展了传统美学的空间和内涵。陈寅恪充分肯定了王国维在学术上的开拓与贡献，认为正是王国维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专于学术研究与思考，才保留和延续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开创了文化新时代^④。

五四时期开启的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由于政局动荡、战争频发而未能正常延续，以至中断。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等历史任务，加之与西方世界的隔绝，文化转型步伐依旧迟滞。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经历了又一次规模空前的现代转型，这是在时隔半个世纪左右再度开启的以西方现代文化为资源的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而这个时期西方现代文化本身也经历巨大变革与发展，形成相应的文化理论与学术积累，这使得现代性的重启以对西方文化思潮与文艺理论的大量引进为开端。新时期伊始，“伴随着当时整个社会对‘现代性’的追求”，“一种以西方为参照系、出于对落后的焦虑和对于进步的渴望，并寄希望于凭借快速效仿、掌握的形式和技术来赶超世界的发展”^⑤。短期内超负荷补课使国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得以跟上世界文化发展步伐，实现与当代最新文化艺术观念的对接，促进了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但这个过程也一度忽略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且这一次的情形不同于五四时期，那时文化启蒙者大都拥有深厚的旧学修养，在反传统中不自觉地受到传统的深层影响。而新时期以来，文化创造主体的传统文化根基由于历史原因多半难以与五四文化先驱们比肩，在此情形下，西方文艺思潮与文化观念成为一个时期文艺领域话语建构的重要因素，并构成广泛影响。文学领域中，西方意识流、叙述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新批评、文艺心理学等思想理论著作大量

① 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面前》，《中国青年（上海 1923）》第 1 卷第 10 期，1923 年。

② 杜维明：《对话与创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25 页。

③ 鲁迅：《自题小像》，《鲁迅全集》第 7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447 页。

④ 袁法周：《“美”的启示》，《水中盐——文化艺术视角下的王国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 年，第 186 页。

⑤ 刘晓希：《两种“现代性”——对 1979 年三部中国电影的叙事伦理分析》，《文化研究》2020 年第 1 期。

翻译引进,使新时期小说及其文学评论的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新的美学原则与风格层出不穷、更迭频繁,文学批评观念日益更新。在审美现代性的历史诉求下,一大批学者在介绍和运用西方新潮理论和方法过程中,推动了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不仅“富有深度和启发性”,也从“社会个人话语”角度,“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以往文学研究的话语方式”^①。当然,短期内大量吸纳西方新思潮虽然是新时期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需要,但也因此缺乏必要的筛选和细致的甄别,“这种将西方理论与方法直接用于作品分析,并一一对号式的研究,也带来了文章的粗率和模式化,这是此时期向西方学习的共性特点,也是局限性所在”^②。更为重要的是,很大程度忽略了传统文学理论的运用,也缺乏中西美学融合的持续探索与创新努力。在艺术领域中,西方现代派、后现代艺术及其观念也被大量引进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化资源,印象派、野兽派、达达主义等对中国绘画、雕塑、陶瓷、乃至书法产生了深刻影响。就绘画而言,西方现代艺术中基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形成反传统、个性化表达的特点,对中国传统水墨画艺术形成冲击和影响,使中国艺术家对传统水墨画进行了各种现代性探索,尝试了表现水墨、抽象水墨、观念水墨和实验水墨等创作方法与美学风格,在突破传统水墨美学方面进行了有益实践,“是民族本土的艺术走向现代艺术当代的必然”,“充实了中国画的精神意境”^③,但被普遍认可的创造性艺术实践成果还不多,核心的问题是:艺术家对传统水墨艺术精神精髓还缺乏深度理解,对西方现代艺术本质把握也趋于表象,唯有深入洞悉中西艺术内在精神,并形成自身独特理解,才能实现原创意上的突破。这个时期电影艺术的探索与成就,被国际认可程度明显较高,个中缘由是与电影产生于近代并直接输入的结果,其艺术形式与美学没有传统根基,相对来说不存在现代转化的困扰,因而与交响乐、芭蕾舞、话剧等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中现代性较为成熟的艺术门类。

步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传统文化转化创新有了更高要求,主流媒体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央视将经典文本经由多种形式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视听文本,以适应当代审美趣味的变化需要,创作了一批源于传统文化的高水平视听作品。从《国家宝藏》到《中华诗词大赛》,从《典籍里的中国》到《衣尚中国》,无不体现了对传统精髓的提炼、转化和再造。《经典咏流传》则将“和诗以歌”作为核心创意点,摒弃既往类似节目的竞演因素,以历史诗词为依托进行创作改编,谱以新曲,将学者的专业解读与明星歌手的现场演唱相结合,实现专业品味与大众传播、文本阅读与视听表演的完美结合,在立意与创意、形式与技术等方面都实现新的突破,达到良好的视听体验效果。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对历史原典的再创作,不是以娱乐为导向,而是以传承弘扬优秀文化基因为旨归。《上线吧,华彩少年》,虽然是年轻人的才艺展示,但却表现出青少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及其在融合现代时尚进行创新的执着与才能,预示着一个秉承传统进行文化创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哪吒之魔童降世》作为动漫大片,运用成熟的数码技术,将浓厚传统色彩与鲜明的当代审美趣味相融合,荣登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第一,改变了好莱坞动画电影垄断高票房的历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风动画大片。

从文化本体角度考察当代中国文化本体性建构,离不开文化现代性问题。从上述若干历史转型期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现代转化的历史梳理与经验中,我们看到:文化现代性是一个历史过程,每一次转型虽然都存在历史局限与偏颇,但也提供了一定的符合时代需要的美学新质,由此丰富和拓展了传统文化美学,同时体现了传统美学的巨大生命力。历史启示我们,当代中国文化本体性建构的文化美学支撑,应在深度把握传统文化美学前提下,以当代立场和世界眼光,运用先人文化智慧、吸纳外来文化优长,进行创造性阐释与挖掘,使本体支撑建立在鲜活的文化美学传统与优质的异域文化资源的融合基础之上。

① 张福贵:《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② 王兆胜:《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兰州学刊》2016年第1期。

③ 李广南:《浅析西方现代艺术对中国实验水墨的影响》,《美育时代》2007年第9期。

四、文化实践意涵：主体性的动力支撑

如果说文化政治意涵是文化主体性政治理想的呈现形态，而文化美学意涵是文化主体性理论认知的表现形式，那么，文化实践意涵就是文化主体性现实具体的实现形式。前二者作为文化政治、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化主体性，其所确立的文化价值向度、审美取向，必须由文化实践创造的成果作为实现形式，同时，后者还将随着社会变迁、时代进步而提出新的问题与诉求，从而不断推动文化政治、文化美学的更新发展，成为文化主体性的动力支撑。

步入新发展阶段，传统文化美学现代转化必然有其新的时代内涵与任务，如作为人文科学“应积极回应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创变及议题，结合历史条件与社会关系评价科学技术的意义”^①等。同时这些内涵与任务依然是现代化进程中未有终结的一个环节，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将赋予现代化新的内涵，传统美学现代转换也将面临新的问题。“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在不断吸收、变化和更新的过程中发展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何文化传统都不是固定的、已成的(things become)，而是处在不断形成过程之中的(things becoming)。它不是已经完成的‘已在之物’，只要拨开尘土就能重放光华，更不是一个代代相传的百宝箱，只消挑挑拣拣，就能为我所用。传统就是在与外界不断交换信息、不断进行新的诠释中形成的，传统就是这个过程本身。如果并无深具才、识、力、胆的后代，没有新的有力的诠释，文化传统也就从此中断。”^②因此，从当代实践角度考察文化主体性建构，更具有动态性和现实性，是传统文化美学价值再发掘、再更新的实践性过程，由此形成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动力支撑。事实上，“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③。

在新发展阶段，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动力支撑，不仅需要更多源自于传统文化智慧和更鲜明的传统文化底色，而且需要更多源自当代文化实践的探索和更贴合人们高质量文化需求的创造。主体性建构的实践探索意涵，是文化政治意涵、文化美学意涵在现实层面的价值呈现与创造，是文化价值在制度安排和本体认知基础上的实现形式；同时也是文化政治之设计科学与否、文化美学之价值认知正确与否的实践检验和评判，能为文化制度的完善与文化本体的丰富提供来自实践的经验 and 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唯有“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④，才能真正得到彰显。相形于文化政治与文化美学，现实领域的文化实践拥有诸多维度和复杂情形，既充满着无限的创造可能与活力，又存在着莫测的前景趋向与困局。把握文化实践探索的若干重要维度及其发展趋向，不断进行文化反思，提高理性自觉，将有利于不断完善制度与策略，积累更丰富的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中国经验。鉴于文化主体性建构实践维度的多向性，在此着重探讨造物文化领域中传统美学现代转化。

在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遗产中，造物文化是其主要构成，并占据极为重要地位。造物文化相对精神文化而言，具有文化折扣低而易欣赏接受、日常运用广而易融入大众的特点，因而从文化遗产角度来说，造物文化遗产更容易获得除专家学者之外的大众百姓的关注与喜爱。但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人们关注精神文化传承远胜于造物文化，在学术领域的研究亦是如此。有学者指出，“世界范围内，在以往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中，西方学术界做了很多工作”^⑤。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描述造物文

① 南帆：《乐观的前提：祛魅与复魅》，《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② 乐黛云：《序二 自由的精魂与文化之关切》，汤一介编：《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13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

④ 《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第35页。

⑤ 汪小洋：《美术考古与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保护》，《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化领域的研究情况,比如对明式家具最早的系统研究不是来自中国学者,而是德国学者艾克的《中国花梨木家具图考》,他自1923年来到中国,经历了26年的东方异域生活与考察,毕十多年心血完成此书,成为世界第一部有关中国古典家具研究且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的专著。这部著作的出版恰逢西方工业设计兴盛之时,而其系统阐发的明式家具设计之美,引起西方世界极大关注并产生深远影响,以致成为丹麦著名设计师汉斯·瓦格纳家具设计的灵感来源。尽管此后我国也有了一批造物文化研究著作出现,但在实践领域对造物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还缺乏有意识、成系统的探索。今天,这种状况开始有明显改变,当代中国设计师从传统造物文化汲取营养,逐步实现从传统审美符号与元素的运用,转向审美精神的运用与创造。

当代中国设计是文化主体性动力支撑的重要方面,设计力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软实力。传统造物文化的现代转化,如何使现代设计从美学形式层面转向美学精神层面,无疑是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深入探讨和实践创新的问题。当下体现主体性的创造,应从初期幼稚的堆砌、移植传统文化符号,走向成熟的融涵、创化传统美学精神。建筑是一门综合性艺术,是在汲取其他门类艺术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建筑的审美不是靠简单的某个人能够提升的,是一个高度社会化、高度综合性的整体社会状态的表达,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达到一个高度的时候,才会产生建筑审美”^①。建筑作为一种嵌入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可以直观地、无所不在地以切身体验方式,唤起民族情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为此,我们着重从建筑文化维度,进行主体性建构的实践意涵分析。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筑设计已不应该简单地再现传统的形式特征,如秦砖汉瓦、大屋顶等中国传统建筑的‘形似’,而是要在设计中传承中国文化的‘神似’,体现中国空间的‘意’”^②。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物化形式的古代建筑,它不仅与精神文化如《诗经》《楚辞》以及历代诗词歌赋的诗性审美相融通,而且与其他艺术门类存在密切关系,这使得“中国传统建筑设计文化的意蕴深藏于各种古典建筑形态以及雕塑、绘画、民间工艺和各种器物等组成的庞大的文化体系之中”^③。在一个时期里,传统建筑文化的现代转化虽然有成功的探索,如苏州博物馆、中国银行总部大楼、上海金茂大厦、宁波博物馆与浙江富阳文村新民居等;但总体而言,大规模城镇化过程中涌现的现代建筑,基本上还是西方现代建筑模版的照搬和移植,部分源于传统建筑文化的设计,也存在传统建筑符号与元素简单拼贴、生硬挪用、无序混搭的浅表化运用之中。这种方式的传承或许在现代性过程的初期可视为创新,如清末在家具领域出现了融合西方装饰元素的尝试,到民国则出现为数不少的中西合璧建筑与家具,这些具有现代感的造物有些已被列为文物或被收藏家所青睐,其设计上的现代性探索努力与轨迹清晰可见,可以成为当下现代转型的借鉴^④。但今天的现代性诉求随着技术、材料、审美的发展,不能再停留于传统文化符号运用,而是要建立在当代科技和生产条件下的传承,且要置身于全球文化发展与格局中去把握。况且,一批早期现代性探索的经典作品本身也已被纳入文化遗产之列,如20世纪遗产就是这个时期的创造,如今已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如巴黎的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20世纪50年代列为十大建筑的北京火车站,都已作为文化遗产受到法定保护。那个时期的现代建筑,体现的是当时的技术与审美,“20世纪建筑旨在表现新的时代精神和创新理念,往往建立在新的艺术风格和空间特点基础上,采用新结构、新技术和新材料加以体现”^⑤。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快速迭代与发展,现代性的范

① 解读《中国和美》,王澍:和而不同的一个核心是多样性, <https://www.163.com/tech/article/G7P347DL00099504.html>, 访问日期:2021年10月15日。

② 董雅、王艺桐:《对中国传统建筑设计文化传承与再生的思考》,《建筑与文化》2015年第11期。

③ 陈高明、董雅:《从历史中建构未来——论中国传统建筑设计文化的传承与再生》,《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④ 单霁翔:《20世纪遗产保护的理念与探索(一)》,《建筑创作》2008年第3期。

⑤ 单霁翔:《20世纪遗产保护的理念与探索(二)》,《建筑创作》2008年第4期。

式已经发生转变,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现代性不只是对传统而言,甚至是对现代性早期而言,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有学者将其概括为“超现代性”^①)。文化现代性新范式,就是要打破传统文化符号体系,经由深度转换与创造,实现对传统文化符号体系和美学精神的重构,同时要融入并体现当代最新、最前沿的审美趋势,使现代性拥有世界范围的普遍意义与美学价值。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发展阶段,文化现代性探索不仅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而且要与当代世界最前沿的科技、最先进的观念和最时尚的审美向相呼应,要站在 21 世纪的角度,以全球视野探索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从建筑文化领域来看,对当代中国而言,现代性进程不仅要面对农耕文明创造的古代建筑文化,而且要面对现代化初期创造的 20 世纪遗产,同时还要面对如何开启人工智能时代的建筑设计文化。但不论面对何种情况,都必须从传统出发,进而推动超越传统的现代转化实践。中华古典美学中有三个重要的流脉,即儒家美学、道家美学与禅宗美学。儒家美学强调以“仁”为核心的礼乐并重、礼乐相成,主张文以载道、高下尊卑,以及艺术的社会效益,以这一美学为文脉的建筑设计理念,就是体现于古代宫殿与庙宇设计里的中轴线和主次有别、等级差序的空间布局。道家美学强调“以物为量”“大制不割”的圆融之美,主张万物平等、无所贵贱,提倡自然无为、浑成为美,这一美学文脉影响下的设计理念,就是体现于园林设计中的天人合一、人物相融、纯任自然的空间结构,形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美学效果。禅宗美学认为一切声色,皆是佛事,强调物我同一、无我之我、空也为空,注重任用自在、不修之修,是一种空灵、感悟美学,影响了后世李贽“童心说”、袁宏道“性灵说”的形成,其对建筑以及家具设计的影响与道家有相似之处,形成园林与明式家具的简约、空灵、静气和禅意之美。事实上,道家、禅宗美学思想都具有“当下圆满体验哲学”的理论内核^②。尤其是道家老庄美学思想对后世园林和家具等造物文化影响深远,形成独特的东方造物美学风格。唐代深受禅宗观念影响的王维,不仅开创了文人山水诗和水墨山水画的先河,还将山水诗画的意境融入园林艺术,成为园林和盆景艺术家,他依据诗情画意建造的辋川别墅,秉承了其崇尚自然、营造意境的审美追求,叠山理水师法自然,将建筑营造相融于景,开启了文人设计、意境造园的传统^③。到宋代,这一美学传统日益丰富。宋代欧阳修《真州东园记》、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陆游《阅古南园》等都从园林结构角度阐发了造园美学,认为“造园既要遵循其自然性之宗旨,又要考虑到各种结构法则,既要满足其实用的功能性,又要呈现其艺术性和审美性”^④。明代园林美学得到进一步完善,计成《园冶》推崇园林自然写意的美学风格,从叠山理水到花木景观再到建筑营构,无不凸显自然之美,并以“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方式,实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审美宗旨,形成“其完整而深刻的造园思想”^⑤,文震亨《长物志》提出“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⑥的审美标准,“这种审美观受到道家老庄哲学的影响”,“即老子所谓‘道法自然’,表现在造园活动之中,体现为追求一种非人工雕琢的自然天成之趣”^⑦。而与之相应的明式家具也发展出“简素空明、不事张扬的审美意趣和审美取向”,“形成尚简、尚清、尚淡、尚精的艺术风貌”^⑧。

这些浸透着老庄哲学思想的美学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造园在空间结构处理上所形成的对开合、晦明藏露、虚实动静、阴阳有无、远近高低、内外深浅、物我灵肉等多组对位要素之间互为转换融

① 吉尔·利波维茨基:《超现代时间》,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② 朱良志:《一花一世界》,第12页。

③ 王琳:《从王维山水诗看中国古典园林的审美意蕴》,《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年第8期。

④ 刘桂荣、查律:《中国艺术批评通史(宋元卷)》,叶朗主编、朱良志副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16页。

⑤ 朱志荣等:《中国艺术批评通史(明代卷)》,叶朗主编、朱良志副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81页。

⑥ 文震亨撰:《长物志》,胡天寿译注,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⑦ 朱志荣等:《中国艺术批评通史(明代卷)》,第193页。

⑧ 严克勤:《天工文质:明式家具美器之道说略》,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44页。

合的美学原则,这是我们今天可资运用的珍贵美学遗产。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言:“建筑就是空间的感觉。建筑不在屋檐、瓦片等技术方面的东西,而在于内部空间。建筑是一个创造空间的艺术。”^①此思想可谓深得建筑文化精髓,也由此看出中国传统建筑美学在空间处理上的独特美学追求与深厚文化底蕴。苏州博物馆在空间设计处理上,就深得园林美学精华,贝聿铭认为,“在中国做建筑,不能想象不做园林”^②。但他绝不是模仿古典园林,而是以其美学原则进行现代园林式博物馆设计。在空间结构与尺度方面,运用曲折尽致、散点透视的布局方式和适宜的尺度体量,构筑起若干建筑小空间的有序组合,“而且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移步换景,与中国传统建筑的体验类似”^③。在园林构筑要素方面,虽然苏博也运用了回廊、漏窗、小桥、凉亭等古典园林必不可少的元素,但都在现代性探索思路下作了创新转化,将回廊全部移入室内,既达到贯通整个建筑空间的作用,又符合现代社会人们对室内空间使用空调和舒适度的需求;将漏窗和凉亭进行简化处理,并采用现代玻璃和钢构材料;小桥设计成平桥形式,以呼应较大的水系面积与敞开式格局。在外观色调造型方面,选择粉墙黛瓦的协调色,使新建筑悄无声息地融入周边多个古典园林,造型虽然是板块几何形为主,但其体量的小巧玲珑化解了现代建筑的生硬质感,在曲折尽致的布局中生发出各种趣味与惊喜。在材料的选择方面,贝聿铭坚持不用传统的瓦片,而采用青色花岗石材,使现代材料具有传统色彩与质感,在他看来,自己设计的是现代建筑,用上瓦顶如同穿西装戴花翎帽,但他不是将石材做成平顶,而是做成小斜坡,使形态与传统屋顶相协调。在景观营构方面,既继承先人“以壁为纸,以石为绘”的传统,又独出心裁地抛弃使用太湖石,而以富有现代感的片石作假山,其造型又源自米芾的山水画,将古典与现代天衣无缝地融于一体。经由一系列园林美学原则的创造性运用,使得苏州这座现代博物馆具有诗情画意般的美感,基本实现了贝聿铭学习古代诗人、画家把做园当成是作画作诗一样的理想。贝聿铭作为一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虽然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坚持现代主义审美与几何逻辑,但他却在实践中体现出浓厚的东方情怀和素养,追求圆融、和谐、平衡的审美效果,他相信他的建筑自己能说话,能传达出他内心深处的审美追求。

随着越来越多创造性地运用中华美学的艺术家、设计师的涌现,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实践意涵将不断丰富发展,并为世界文化发展提供美学智慧。早在18世纪,中国园林就受到西方追捧,苏格兰人钱伯斯认为中国园林有着杰出的布局,所表现的趣味是英国长期追求而没有达到的^④;老庄美学亦远播西方,美国20世纪视觉艺术家凯奇,不仅深切领悟《庄子》中无为而自然的美学思想,其名著《沉默》在美国艺术界产生巨大影响^⑤;日本对中国禅宗思想和园林艺术的汲取更为深厚,形成日本禅艺术的七性格:“不均齐、简素、枯高、自然、幽玄、脱俗、静寂”^⑥,以及追求侘寂之美的枯山水审美旨趣。不难看出,中华美学从古至今,都能在与其它民族文化融合中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文化主体性建构生生不息的动力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⑦。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不仅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背景下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涵与支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

① 《阅读贝聿铭》,《北京晚报》2001年6月29日。

② 李菁、贾冬婷:《百年贝聿铭》,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第250页。

③ 李菁、贾冬婷:《百年贝聿铭》,第249页。

④ 萧默:《建筑的意境》,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30页。

⑤ 刘桂荣:《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30页。

⑥ 柳田圣山:《中国禅思想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9页。

⑦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2021-07/01/c_1127615334.htm,访问日期:2021年10月15日。

需要以史为鉴、展望未来,深刻认识现代化新范式新诉求,深刻把握新技术革命条件下文化创新发展规律,全面、系统、深刻认识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多维面向与复杂情状,坚持以系统观念谋划、统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凸显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优势与文化特色,高质量推动新发展阶段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更好讲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故事,不断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内涵,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终成为现实。

Triple Connot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Guan Ning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350025, P.R.China)

Abstract: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Cultural subjectivity is the sense of values, historical views, national concepts and state outlooks embodied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fields such as political system, histor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contemporary practice, and presen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cultural ge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 cultural subjectivity not only internally determines a political system, but also is regulated by its current national system. The traditional ideas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or advocating good governance have become the inherent wisdom of the current institutional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that all rivers run into sea and the world belongs to all people makes Marxism become sinicized and a guiding ideology, which provides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lication of cultural aesthetics, the logic of “culture-thought” in cultural subjectivity comes from that of “politics-history”, it has a broader and deeper connotation across nations and countries. Traditional cultural aesthetics can not only disseminate the core values in a vivid manner but also propagate Chinese culture, tell Chinese stories, shape Chinese images, and build up ontological support for cultural subjectivity with unique aesthetic style and tempera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lication of cultural practice, cultural political connotation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political ideal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cultural aesthetic connotation is the present appearance of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while cultural practice implication is the instantiation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value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 established by cultural politics and aesthetic ideology must be realized by the achievements created by cultural practice. Cultural practice will also raise new questions and demands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so as to constantly promote the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politics and cultural aesthetics and to become the dynamic support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Keywords: Cultural subjectivity;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Cultural politics; Cultural aesthetics; Cultural practice

[责任编辑:郝云飞]